

约翰·F·肯尼迪 和 新的一代

[美] 戴维·伯纳著



David Burner

*John F. Kennedy
and a New Generation*



(美)戴维·伯纳著

约翰·F·肯尼迪 和新的一代

立义 明玉译

戴
)
国
与
合
作
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David Burner

JOHN F. KENNEDY

AND A NEW GENERATI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8

根据斯科特,福尔曼公司1988年版译出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Glenview, Illinoi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1988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David Burner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Publisher wishes to thank USIA
for making this edition possible.

约翰·F·肯尼迪和新的一代

[美]戴维·伯纳著

立义明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5.5 插页4 字数121,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3,500册

ISBN7-5327-1155-2/D·031

定价: 8.90元

(沪)新登字111号

《约翰·F·肯尼迪和新一代》一书系奥斯卡·汉德林编选的《美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一种。作者戴维·伯纳(1937—)除本书外,还著有《火炬被传下去了:肯尼迪兄弟和美国自由主义》(1984年,与托马斯·R·威斯特合著)。

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也是美国第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总统。他出任总统时间不长,仅两年零十个月(1961年1月到1963年11月),但内政外交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的总统时期被称为卡米洛,或肯尼迪王朝。肯尼迪总统虽已去世多年,但至今仍未被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遗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自由派人士和保守分子迄今还肯定他的政绩。在他的身上,似乎体现着美国的“光荣与梦想”。当然,肯尼迪对政治和世界事务的观点和态度不可能同我国的相符,但凡有志于研究美国历史的人不应该忽视他的思想。

肯尼迪死后,有关他的书籍汗牛充栋,不下数十种之多。作者在本书中以夹叙夹议的方式,介绍了约翰·肯尼迪的家庭背景、政治经历以及担任总统后在国内外政策上的所作所为。全书篇幅不长,但材料较为丰富,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肯尼迪的一生乃至美国国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90年7月

编者前言

1963年11月,有几天美国举国上下都集中注意力于一件大事,它从达拉斯的暗杀开始,到华盛顿举行的国葬而结束。约翰·F·肯尼迪遇刺身亡的实况被拍摄了下来,并不断地重新放映;富有戏剧性的余波是暗杀肯尼迪的凶手在电视摄像机前被人枪杀;黯然神伤的出殡行列,徐徐向墓地走去;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无比的悲痛,从而使全国团结在一起。

在那年,肯尼迪总统远远没有达到他深孚众望的巅峰,离大选还有十二个月的时间,他还面临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全国忘却那些疑难之事,却赋予他一个殉难烈士的形象,显然表达了国家本身要求团结的愿望。这个出乎意料的、完全随心所欲的举动,看来象征着现代生活的变化无常。

它还使许多希望落空。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已开始在国内外出现的复杂情况,可是许多人意识到三年前引起的期望尚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有些公民回忆起总统的就职演说。在华盛顿一个寒冷的冬

日,这位新当选的年轻总统冒着飘舞的雪花发表演说,号召他的同胞去应付无法回避的挑战。“不要问祖国能为你们作些什么;要问你们能为祖国作些什么。”他本人也不十分了解这些话的全部涵义。在以后的几年里,响起了这些口号——新边疆,争取进步联盟,新一代。它们唤起了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梦想,与当时离任的年老总统的施政恰成对照。

实际并非这样,我们的作者对这种对比进行了研究。约翰·F·肯尼迪在现实中和外表上都显得朝气蓬勃,但也许不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出身于特殊的上层阶级,它兼有这样的背景:拥有财富,受过哈佛大学的教育,属于一个有其自己一套规矩的波士顿爱尔兰家族。他出任总统时满怀信心,认为他能够调动国内最出类拔萃的人才去冲破以往年代里的顽固习惯。在他背后,有一位强有力的专横的父亲,尽管并非始终露面。这些影响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他对严重的国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回答,并且给一个本身饶有兴趣、又可说明在1960年后至关重要的年代里美国怎样发展的史实提供了富有戏剧性的材料。

奥斯卡·汉德林

目 录

编者前言	1
1 肯尼迪家族的一员	1
2 崭露头角, 1945—1960年	21
3 在竞选讲坛上	40
4 新一代	59
5 处于战争的边缘?	74
6 越南	96
7 失望的火焰	114
8 现在我们全是凯恩斯主义拥护者	136
9 “火炬被传下去了”	149

1

肯尼迪家族的一员

1960年夏，有人问一些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们希望那年的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和理查德·M·尼克松中哪一位当选为美国总统，并说明理由。一位华裔学生回答说，“约翰·F·肯……因为他使我感到是个美国人。”当时具有各种不同出身、对自己的美国公民身分不完全感到欣慰的人，今天对肯尼迪总统短暂而辉煌的执政时期同样表示怀念。也许从历史角度来看，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这个名字之所以能永放光芒，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能以罗马天主教徒这种圈外人身分被选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肯尼迪一下子打破了只有新教徒才能进入白宫这一铁的传统。1960年的大选之夜不仅对不同种族的天主教徒并且对其他少数民族如犹太人、黑人、西班牙或墨西哥裔美国人和亚洲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肯尼迪的成就表明已部分实现了向全国作出的诺言：即使近年来才移入的美国人也有可能获得财富、家庭、子女的教育，或正义的理想。

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些梦想就已经在爱尔兰孕育着。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或许比欧洲其他国家都贫困。爱尔兰的地主无视国内的需要，把粮食出口到外国。虽然杰克^①·肯尼迪的祖先们并非爱尔兰最贫困的人，但是由于从美国引入的一种真菌类植物使接连三年收获的马铃薯发黑烂掉，他们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就由于这几次农业歉收，爱尔兰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为了逃避饥荒，登上了去波士顿的臭气熏天的船舱。在这些移民中间有杰克·肯尼迪的第一代美国祖先帕特里克·肯尼迪和他的妻子布里奇特·墨菲。在1849年初，他们历尽艰险，越过大西洋，总算幸运地活下来，一起到达了波士顿。他们住在波士顿港湾的诺德尔岛上用瓦楞材料搭起来的棚屋里，直到那年下半年他们结婚为止。帕特里克当了个箍桶匠，整天同锛子和凿子打交道，把木板做成木桶或者科内斯托加宽轮大篷马车^②上常见的马轭。在其儿子出生后不久，帕特里克三十几岁就离开了人世，也许是死于疟疾，抑或肺病。帕特里克这么年轻就去世，在这座城市里并不少见，那里的移民平均只活了十四年；波士顿穷人的死亡率比欧洲各大城市贫民的死亡率都高。在波士顿的爱尔兰人住在美国第一个大移民区里，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甚至连马萨诸塞州同情南方奴隶的废奴主义者，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存在的生活条件也几乎毫不感到内疚。

然而爱尔兰人的传统性格使移民多少能抵制占优势的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非人格性，这种自由放任经济制度必然会造就

① 杰克(Jack)系约翰(John)的昵称。——译者

② 科内斯托加宽轮大篷马车指早期移民在大草原载货的大篷车，因该马车最初的制造地科内斯托加山谷(在宾夕法尼亚州境内)而得名。——译者

大批冷酷无情的各自为政的个人主义者。虽然爱尔兰人赞成强烈的个人主义，他们却都是在共同的背景下实行个人主义的。爱尔兰的状况使人们产生了基于共同的回忆和神话的无形的忠诚。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爱尔兰人长期来同当地统治着的英国人抗争、打交道，与上级对抗，犹如在美国的民族群体学会同美国的其他政治组织周旋一样。他们的教会、秘密社团和天主教协会活动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组织和一种民族政治地位。在波士顿，爱尔兰移民在街坊集会，参加教会仪式，举行沙龙社交聚会，组织政治俱乐部。他们的参政活动使他们得以在美国有发言权。

然而，那种政治哲学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反对反奴隶制运动、女权运动和公立学校。到二十世纪，某些城市中的爱尔兰人在诸如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厂的安全设施等具体问题上已经有了可观的政治记录。但是由于那些政治活动的背后动机是为了保护家庭、家属和邻里，因此这种明显的进步政见同时也是社会保守主义。在许多二十世纪的爱尔兰移民中，他们恪守优良的传统习俗，同时内心怀着对“赤色分子”的仇视和种族歧视。

帕特里克(“P·J”)·肯尼迪出生在美国，他寡居的母亲经营一家杂货铺赖以糊口。年轻的帕特里克辍学后，当了一段时间的码头工人。后来，他用自己的积蓄，再加上他母亲的储蓄，在当地开了一家酒吧。不久，他又选择政治作为他的第二事业。他给处境困难者以忠告和友谊，向投票者免费赠送啤酒，这些手法使他得以进入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不久他又进口海格和海格牌苏格兰威士忌酒，把它售给波士顿较高级的旅馆和饭店。1888年他支持提名格罗弗·克利夫兰竞选美国总统。帕特里克·肯尼迪绰号“东波士顿市长”，被认为是当时波士顿四名最有影响

的幕后政治家之一。后来他以酒商兼银行家为生。他娶了布罗克顿市市长的妹妹玛丽·希基为妻，这提高了他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虽然帕特里克和玛丽都会演奏古典音乐，他们的一个女儿说她的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的母亲是个空想家，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了构成东波士顿的海湾各岛上的朴素的岛民生活。当时波士顿的政治，不管是好是坏，无疑两者兼而有之，主要为爱尔兰人所支配，而且P·J的一个后代最终将在此基础上成为他国家的领袖。然而，它并非是由像坦慕尼厅那样的单一政治机器所控制的政治。个别的宗族族长，如马丁·洛马斯尼、丹尼尔·科克利、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和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都使用冷酷无情的手法去控制他们的支持者。而约翰·F·肯尼迪的父亲和祖父则拥有马萨诸塞州一大片地区（包括剑桥、布赖顿和沃索姆的部分土地）的所有权，这终于使约翰·F·肯尼迪在国会中赢得了席位。

P·J的儿子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1888—1969），其父母把他从东波士顿的泽维里恩学校转到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去读书。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从爱尔兰贫民区逐步高升，跨进了更为广阔的商业界、政治界和外交界。这显然（尽管并不是有意识的）是要脱离一个内向型的社会，脱离一个为威廉·奥康内尔大主教经常告诚信徒们不要把子女送到新教学校去这样的禁令所严加约束的社会。年轻的乔·肯尼迪在童年和青年时代就不懈地追求财富。“我们怎样能挣些钱呢？”是他童年时代特有的招呼语。像艾尔·史密斯一样，他在市区人行道上叫卖报纸，对当地居民十分熟悉，还同流氓、妓女和敲诈勒索者厮混在一起。乔是他的教区学校垒球队——圣母升天队——的队长，他用他的收入买了引人注目的垒球队制服，同一个有绅士风度的球队

普莱费尔斯队较量。乔的队员们把普莱费尔斯队打得一败涂地。在大学时代，乔经营一辆观光旅游车，穿梭于波士顿的老城区，赚了大约一万美元。

在波士顿拉丁学校，漂亮爱交际的乔准备进入哈佛大学。乔是个学习不专心的学生，多读了一年才拿到文凭。他打垒球、橄榄球，当篮球队的干事，指挥训练团，并设法选上班主席。学校的年刊预言他将“以非常迂回的方式”使自己出名。哈佛大学录取了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哈佛大学差不多接受所有富有家庭的子弟入学。在哈佛，乔放弃了难学的经济学，改学要求较低的音乐专业。后来他对古典音乐的爱好几乎一直深藏不露：对一个讲究实际的商人和政治家来说，古典音乐也许显得不够“刚健有力”。他不论在大学里还是在以后的生活中都很少看书。虽然乔在体育方面颇有成就，并善于交朋友，但是他却未被哈佛最上乘的社交俱乐部接纳为会员。有人认为他所以未被接纳是因为他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但一位哈佛教员回忆起一个不同的说法，乔说谎习以为常，因而被拒绝参加。

乔毕业时，为了达到在三十几岁就成为百万富翁这一目标，选择了银行业作为捷径。他起先不考虑搞政治，因为他相信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因为政治依赖于变化不定的群众而不是取决于他自己内在的力量。正如他后来对妻子说的那样，他需要“金钱提供的自由，来去的自由，喜欢来去哪里就来去哪里，喜欢什么时候来去就什么时候来去，喜欢什么方式来去就什么方式来去”。为了学习银行业务，他在父亲的东波士顿哥伦比亚信托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他就当了州银行助理审查员。肯尼迪解释说，“如果你想挣钱，你就必须弄清钱在哪里。”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以借款使哥伦比亚信托公司免遭合并，并担任这家

小银行的行长职务。他自称是(但或许并不是)本国最年轻的银行行长。乔·肯尼迪看到了立法对银行的影响,他的政治知识也随之成熟了。

雄心勃勃和热爱生活使约瑟夫·肯尼迪踏上了罗斯·菲茨杰拉德的门阶,她是波士顿引人注目的市长约翰·菲茨杰拉德的女儿。人们管约翰·菲茨杰拉德叫“菲齐”,后来又管他叫“菲茨”或甜蜜的“宝贝菲茨”。菲茨杰拉德的祖先也可追溯到韦克斯福德县。菲茨杰拉德家族也美国化了。罗斯的祖父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863年生于波士顿的北端。那是个移民区,那里每十个孩子中有三个不到一岁就夭折了。约翰的父亲是个小贩,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杂货商。约翰的双亲日益富裕,1879年他们把卖报的儿子送到波士顿拉丁学校求学。他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但由于父亲去世,未毕业就离校了。他的离校一定是出于习俗而不是由于穷困,因为他父亲留下了一大笔房地产。约翰于是当了当地的一个老板的学徒,他全心全意地追随着他的老板。1889年他娶了玛丽·汉农为妻子,她是一位性情开朗而文静的姑娘。

菲茨杰拉德夫妇的女儿罗斯生于1890年^①,她被培养成为爱尔兰的名门闺秀。她在中学里学业成绩名列第三,又被选为毕业班中最美丽的姑娘。她进入了波士顿康芒韦尔思街的圣心修道院。她一直想进韦尔斯利学院,但是奥康内尔大主教劝说她的父亲不要把她送到非教会学校去。她回忆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进入韦尔斯利学院。这使我终身感到有点惋惜。”第二年,她的父亲当了第一任期的市长后,怕出政治丑闻,便把她

① 1990年7月,罗斯·肯尼迪在海恩尼斯港的家里度过了她的一百岁生日。——译者

送到德国北部布卢门撒尔的一所天主教精修学校。在那里她掌握了德语和法语，并学会了有关孩子、教会和烹饪的课程。学校气氛冷漠，校规严厉。每星期天上午，所有学生都要聚集在小教堂里，对每一个女学生的行为进行评论。诸如走路太快，或者没有在圣像前屈膝行礼都算是缺点。罗斯也许在那所德国学校里失去了她的一些自发性和独立性。但当她回家以后，她在曼哈顿维尔学院（圣心修道院的一所分院）主持慈善团体和社会俱乐部，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参加一个小规模的戏剧团体，并成为波士顿公立图书馆选书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她自称是“波士顿青年天主教徒的领袖”。

宝贝菲茨长期过着一种富有色彩的生活。他为了点小事就会唱起“可爱的艾德林”这首歌来。有一次，一辆卡车失去控制，他救出了几个小孩以后，自己却被这辆卡车撞倒了。他非要坐起来高唱他那首作为标志的歌，向旁观者表明他没有问题，才让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去。后来富兰克林·D·罗斯福派他去作一次友好亲善的国事访问，宝贝菲茨从哥伦比亚到阿根廷一直唱着那首“可爱的艾德林”歌曲。根据一位熟悉他的人回忆说，“他可以每分钟二百个字的语速跟你滔滔不绝地谈上十到十五分钟，顶多让你插两三次话，然后他拍拍你的背，对你说他对这次谈话感到多么愉快。”像他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政治家一样，宝贝菲茨能使城市里的一般平民都能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而上流社会的名门望族却往往做不到。他有一支“守夜队”，他们代表他参加市里的每一次守夜。他东山再起，又一次参加市长的竞选活动时，指责他的对手反对天主教，因而获胜。菲茨留下的名声欠佳：受贿，任命不称职的密友使市府人员超员，却在贫民区建造学校和医院；后来他因在选举中有欺骗行为而被迫离开

国会。

菲茨认为乔·肯尼迪既有哈佛大学的学历又是银行行长，因此配得上他的女儿。乔和罗斯在1914年举行婚礼，住在马萨诸塞州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聚居的布鲁克莱恩区的一所房子里。乔的银行工作经验使他有资格担任老侨民区地产公司的财务员。这家公司专向新来的爱尔兰人出售中产阶级的市郊土地。在那里爱尔兰人不会受到“不良分子的侵犯”。公司也买进拖欠押款的土地，并在那些贫穷的爱尔兰或意大利家庭还未重新油漆并出卖他们的房屋之前就把他们赶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乔任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昆西的船厂的助理总经理，年薪二万美元。乔虽然对造船业一窍不通，但却精于财务。船厂打破了生产记录，在两年内建造了三十六艘驱逐舰，而乔却犯了溃疡病。肯尼迪拒绝在未付清船款之前把两艘大型驱逐舰送往阿根廷，但四艘美国海军拖船及其武装人员在海军部助理部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命令下把这两艘驱逐舰拖走了。乔·肯尼迪和罗斯福两人由此学会了相互尊重。乔对他的朋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说，罗斯福甚至比乔本人还要顽强。

二十世纪初是美国银行家的时代，二十年代中期则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多头证券市场。在二十年代乔几乎学会了操纵股票市场的一切伎俩，从内部交易牟取了暴利。他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管理部门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股票持有者的利益。但是使拜金的美国人失望的是，金钱并不能很快在上流社会里买到一席之地。在肯尼迪成长的年代里，波士顿的报纸为爱尔兰人辟一社会专栏，为古老家系的美国人又另辟一社会专栏。不论在新教避暑胜地科哈塞特，还是后来在科德角的海恩尼斯港（肯尼迪一家以一辆有司机驾驶的梅红色罗尔斯-罗伊斯牌高级轿车在

当地炫耀)，肯尼迪家族在社会地位上都没有被人们所完全承认。肯尼迪未被科哈塞特高尔夫球俱乐部接纳为夏季会员，而科德角社交季节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女子名单中也未列有他的女儿们的名字。1926年，乔虽然在科德角仍保持着他的避暑别墅，但却终于用私人火车把他日益增多的家属迁往纽约州的韦斯切斯特县——最初暂住在里弗代尔，后来搬到布朗克斯维尔的特定社区。肯尼迪家被夹在两个阶层之间；他们不愿与下层的爱尔兰人交往，而许多新英格兰人仍冷落他们。数年后，肯尼迪反对一家报纸称他为爱尔兰裔美国人。他迷惑不解地说，“我出生在这里。我的孩子们也出生在这里。到底要我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美国人呢？”

乔·肯尼迪无视这些阶级差异，抛下了他的妻子（罗斯在1931年最后一次怀孕后，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不肯再与他有性生活），在二十年代后期去了好莱坞。大约有三年之久，他从事一个意想不到竟大赚其钱的暴发行业，因为这个行业迎合了自己制作的要求。每周有六千万美国人去看电影。肯尼迪从制作成本低廉的汤姆·密克斯的西部片和像《一个穷姑娘的浪漫史》与《红热蹄》之类的情节片就赚了近六百万美元。他开始与好莱坞无声片时代的影后格洛里亚·史璜生发生暧昧关系，便暂时放弃拍摄这些粗制滥造的影片。“格洛里亚需要照料”，一个提供内情者告诉他，史璜生挥金如土。史璜生当时28岁，已经结过三次婚。在那个时候，摄影机和灯光照明都要求非常年轻的女演员，因此28岁正是一个电影明星最佳的年龄。乔让她在糟糕的《凯利女皇》一片中担任主角，该片由大胆的过度追求尽善尽美的埃里克·冯斯特罗海姆导演。它描绘一个舍己为人的妓女修女，肯尼迪诡称由于道德上的问题，终于取消了该片的发行。

1950年《凯利女皇》的续集《日落街》上演，史璜生在该片里出色地扮演了一个上了年纪的电影女明星，冯斯特罗海姆扮演她的男管家和密友。乔设法补偿了史璜生主演《凯利女皇》一片所蒙受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并且从史璜生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侵犯者》的赢利中补偿了他自己的损失。据史璜生说，她对他在一件小事上的意见表示怀疑，乔便决定返回纽约，这样就结束了他们的风流韵事。乔看到经济不稳定，于是就在1929年股票行情暴跌前，把自己所拥有的普通股全抛出了。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乔和罗斯·肯尼迪已有八个孩子。把小肯尼迪们扶养成人是他们共同的事业。罗斯对他们既严加管教又无微不至地关怀，对他们的成长都有记录，很有策略地给他们一些小条子，提醒他们该怎么做，或者以简单的书面形式来教导他们。在每间房间里都放了钟，以免孩子们吃饭或做弥撒时迟到。父亲在家的時候，对孩子们的管教非常严厉。罗斯对孩子们在细小的事情上都要严加训练，例如如何正确使用“I”（我）、“me”（我）^①，使他们在乔面前不致讲错。还要求他们在晚饭前阅读钉在告示栏里的新闻报道，准备同父亲讨论。有时，他们家庭的谈话往往涉及当前国家的重大问题。有时，一个孩子扮演一位制宪元勋，根据《联邦党人论文集》的论点进行争辩。由于许多“谈话”都是乔的训词或者是启发儿子们作出确凿的问答的问题，因此总的结果是使年青的杰克·肯尼迪热爱读书并且能够记住大量的信息。男孩子们一般都进新教的预备学校，而女孩子们则被送往天主教学校。

肯尼迪家在海恩尼斯港的大院特别适合于训练男孩子。清

① 在英语中，“我”有主宾格之分，“I”为主格，“me”是宾格。——译者